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 |          |       |
|----------|-------|
| 尊隐       | 大同书   |
| 默觚       | 仁学    |
| 采西学议     | 建国方略  |
| 使西纪程     | 变旧危害  |
| 弢园文录外编   |       |
| 筹洋刍议     | 訄书    |
| 盛世危言     | 新民说   |
| 论世变之亟    | 猛回头   |
| 新政真诠     | 喊的人醒了 |
| 强学—戊戌时论选 |       |
| 民声—辛亥时论选 |       |
| 新潮—民初时论选 |       |

# 论世变之亟

——严复集

胡伟希 选注

# (辽) 新登字 1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胡伟希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58-2

I. 论… 

II. 胡…

III. ①严复-文集②严复-思想评论③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①B256.2 ②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8,000 印张:9  $\frac{3}{8}$  插页:5

印数:1—1,615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朱 枫

责任校对:安丽君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

定价:9.80 元

##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 编序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严复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严复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的时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发以前这段时期。其时，中国近代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严复率先引进与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较系统地宣传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启蒙思想家。

### (一)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4岁时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毕业后实习工作5年，于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并接触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文献，这为严复日后从事思想启蒙工作打下了基础。1879年，严复毕业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第2年，被调往北洋水师学堂，自此，他在这所学校一呆20年，身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才离开。

1895年以前这段日子，是严复思想上比较苦恼和沉寂

的时期，当时，日本大力发展海军，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琉球。严复深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曾对人说，这样下去，不用 30 年，中国周围的藩属将全部丧失，中国自己就会像一头老病牛一样被人捆住。时人对严复的议论并不理睬，李鸿章更是不满意他这种激烈的论调，与之疏远，尽管他后来升至总办，也是“不预机要，奉职而已”<sup>①</sup>。严复对这种境遇也有所感觉，他慨叹：“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sup>②</sup> 不是科举出身，所以言不见重。他决意走科举这条道路，由举人、进士、翰林以至公卿，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至少，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从 1885 年到 1893 年，严复曾先后在北京、福建参加过 4 次乡试，但均未成功。

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将国人从睡梦中惊醒，同时也使严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他无法再沉默了，于是决定著述以警世。在 1895 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几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宣传他的变法主张。贯穿这些文章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如要救亡图强，必须大举学习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不可。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哪里？他提出：“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sup>③</sup> 而对于西方近代的民主宪政，他则概括

---

①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11 页。

②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4 页。

③ 《严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 页。

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说明他是从英国式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的。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严复转入对西方学术思想作全面的、系统的介绍和引进工作。著名的“严译八大名著”，内容包括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大都于1903—1909年这段时间出版。这些译著，除《名学浅说》是意译以外，其他基本上是忠实于原文的直译。在当时西方学术思想刚刚传入，尚无英汉对照的名词术语的情况下，要翻译这些西方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委实不易。正如严复所述，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sup>①</sup>。严复为什么要花费如许气力来翻译这些著作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复兮者勤若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sup>②</sup>可见，严复的发愿立誓译书，是有感于国人对于西方之“新理”过于蒙昧。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民智尚十分低下，如果不从开启民智做下，而只是一味热衷于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即使模仿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只是得其皮毛，不得其实质。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政治思想渐趋保守。由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转而寄希望于“强人政府”，幻想有一铁腕人物出来收拾当时分崩离析的政局，重建社会秩序。在文化观上，他也放弃了早期“全盘西化”的看法，而持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

---

① 《天演论·译例言》。

② 《严复集》，第3册，第527页。

立场。

然而，严复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主要是由他在维新运动时期出色地宣扬西学的工作奠定的。他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直至辛亥革命以前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是他在维新时期思想启蒙工作的继续和扩展。尽管他的政治立场在晚年走向保守，他留下的大量翻译和著述文字，却对后来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严复介绍的西学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却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以英国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他本人也主要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而成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

## (二)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一、提倡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制和政治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是第一位从价值观念上对西方文化予以高度肯定，并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加以否定的人物。他认为西方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远胜于中国，而且在精神文明上也远胜于中国。西方精神文明集中体现在哪里？他认为，这就是它对于“个人自由”的重视。他写道：“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sup>①</sup>从这里看来，他不仅视自由为每个人生而具有的权利，而且认为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它本身就具有终极价值。严复还将

---

<sup>①</sup> 《严复集》，第1册，第3页。

个人自由同法制联系起来。他说：“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而期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sup>①</sup> 这是指个人自由应采取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反过来说，建立法治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自由。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强调法治与个人自由的密切关系，但严格区分了法制与法治。在他看来，法治是在根本大法下的管治，它必须通过法律条文具体化和形式化，但法律条文如果违背了法的基本精神——维护个人自由，则它不能被称为法治。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严复将西方的“法治”区分为“有法”与“无法”两个方面。“有法”方面，是指西方规章制度严密，社会上人们都有守法、遵法的习惯；人们按照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办事，知道什么事该办，什么事不该办。这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法治”（其实是法制）。但是，西方还有“无法”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观念。在维新运动及其后，严复强调的一直是西方法治中“无法”这一方面。这完全是针对中国传统社会历来缺乏“法治”观念，谈起“法治”总是同执行法律条文等同起来，而忘却了法律的制定在于保障个人自由的事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中与西方自由理念相接近的是“恕”和“絜矩”，但“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sup>②</sup>

---

①② 《严复集》，第1册，第3页。

二、提倡经济上的放任主义。严复提倡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治，在于它可以造成一种民富国强的局面。民富然后才可以国强，这是严复讨论国家富强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sup>①</sup> 这一思想使他在考虑国家经济改革问题时，很自然会注目于西方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在《辟韩》中；严复这样表述过他对西方放任主义的向往：“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sup>②</sup> 如果说，在这段话中，其放任主义思想不仅指经济上的不干涉政策，同时还包括有同维护个人自由的政治理论相联系的“无为主义”的话，那么，在后来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他则着重从经济政策与措施上强调实行放任主义对于中国改革的必要性。亚当·斯密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重农学派的重要人物，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包括海外贸易的干涉，反对行业垄断和政府的专卖政策。严复谈到斯密这一经济思想与英国富强的关系说：“观于斯密氏此言，则英伦平税之难行，每禁之难弛，于其时若渺然绝无可望者。然自嘉道之际，英相万锡达当国之后，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至道光二十六年，而平税之政行矣。其去斯密氏成书之日，为时仅四十有五年而已。夫

① 《严复集》，第1册，第27页。

② 《严复集》，第1册，第35页。

何必其国之为乌托邦而后能哉！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sup>①</sup> 在严复看来，斯密《原富》一书的经济思想不但是导致英国富强的秘密，而且其中所论多切合于中国。以“自由贸易”为例，严复认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sup>②</sup> 这种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可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有利于民生，而且最终利国也利君，原因在于“盖国之财赋，必供诸民，而供诸民者，必其岁入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余，而将弃之以为盖藏者也。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岁进数均，而备物致用之权力日大”。<sup>③</sup> 而要使民富裕，又莫若贸易自由，以俾“凡日用资生怡情浚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sup>④</sup> 反之，凡是与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相违背的政策，如“贸易相养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等等之事，其君既必不富，其治也必不隆。故在严复眼里，自由贸易政策实是民富国强的关键项。

与贸易自由相联系，斯密的放任主义经济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随意干预，强调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严复对斯密的这一经济思想极表赞同。他认为，经济活动是追求供求相剂之理，否则会出现经济的危机和社会的动乱。但这种供求相剂之理由市场经济的价格规律在起作用，必须使其事出于自然，若“设

① 《严复集》，第4册，第886页。

②③④ 《严复集》，第4册，第895页。

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sup>①</sup>严复强调斯密这一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说：“供求相剂之理，非必古人所不知。其发之精凿如此，则斯密氏所独到。此所谓旷古之虑也。盖当时格物之学，如夜方旦，斯密氏以所得于水学者通之理财，知物价趋径，犹水趋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顾任物为变，则如纵众归大墟，非得其平不止。”<sup>②</sup>运用这一理论，严复不仅反对政府的垄断与专卖政策，认为“垄断，大抵皆沮抑不通义也”。<sup>③</sup>而且对由政府出令制定利息政策的做法提出质疑。在他看来，由政府出面来颁布“制息之令”，就跟王莽时期由官府出来制定统一的物价政策一样，是十分荒谬的。也许由政府来规定统一的利息是出于“禁并兼者之骏利”的考虑，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却“骏乃益深”，原因在于它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强行推行这种政策，必将导致“糜糜大乱”。总之，无论是提倡自由贸易与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上，严复都同斯密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三、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严复的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是以其功利主义的伦理观点为依据的。功利主义，英文名为 utilitarianism，在近代西方为边沁、穆勒等人所提倡。它的基本原则有二：一是视“快乐”为“善”，一是注重实际效果。就前者说，它与注重普遍原则的义务伦理相反对；就后者说，它与重视动机的伦理学说相反对。严复

---

① 《严复集》，第4册，第855页。

②③ 《严复集》，第4册，第856页。

在介绍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时候，很强调其思想理论背后的功利主义原则。在《天演论·新反》一节的案语中，他专门就“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他明确提出：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而善恶者以苦乐之广狭为分。那么，又如何解释伦理学上人们以“禹墨之胼胝”为善，以“桀跖之横恣”为恶呢？严复解释说：“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sup>①</sup>意思是说，这里的快乐是对整个社会人类来说的，不是指个人的快乐而言。所以，他区分了“自乐”与“众乐”。他说：“人度量相越远，所谓苦乐，至为不齐。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是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使无乐者，则摩顶放踵，无谓甚矣。慈母之于子也，劬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sup>②</sup>总之，严复认为，人们纵使在何者为苦，何者为乐的问题上看法会有不同，但终究无法推翻“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sup>③</sup>这一快乐原则。而按照功利主义的看法，最大的善应是“众乐”而非“自乐”。

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严复在强调“众乐”的同时就取消了“自乐”。事实上，严复的伦理思想的根本特色，倒在论证“众乐”与“自乐”之间，也即社会利益与

---

① 《严复集》，第5册，第1359页。

②③ 《严复集》，第5册，第1359页。

个人利益之间的一致性。他认为，自进化论学说盛行以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在西方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而这一真理，又是被西方近代经济的发展所证实了的。他说，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天下只有浅夫、昏子，而无真小人。为什么呢？因为小人之见，不出乎利，但假如小人的计算立足于长久的利益，那么，这人的行为与做法将不得不同君子一样。所以他提出：“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谿刻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sup>①</sup>从这里看来，严复不仅承认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为正当，而且强调功效原则，认为伦理上的善是获得最大、最长久的利益。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对传统儒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以及“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区分义、利为二涂的说法加以驳斥，指出仅从追求仁义的动机出发，而不计算效果上的“利”与“功”的做法，“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sup>②</sup>在他看来，圣人之制治的奥秘与其说在空谈仁义，不如说是从效率考虑，“合天下之私以为公”。民主政治的目的固然在于保障个人自由，而所谓保障个人自由，实质上就是维护每个人生而具有的追求私利的权利。所以他谈到西方立宪政治制度如何为“义利合，民乐从善”提供了保障时说：“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

① 《严复集》，第4册，第859页。

② 《严复集》，第4册，第858页。

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庇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皆我曾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团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已有而已矣。”<sup>①</sup>

四、提倡思想与言论自由。严复一生对西方自由主义宣传最得力的，是关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观念。由于强调思想自由，他将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了过来，与他的其他译著相比，这是唯一没有添加案语，采取严格直译的译作，这表明了他对穆勒此书观点颇大程度上的赞同。穆勒《论自由》一书被奉为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书中强调在立宪政治已经确立的西方社会，提倡思想、言论自由对于确保个人自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穆勒看来，西方民主社会采取“大众管治”的方式，但这种“大多数人的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人自由得到保障；弄得不好，也许大众政治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较之以往任何形式的政体都更为严重，也更难抵御。他写道：“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

---

① 《严复集》，第1册，第31页。

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刻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sup>①</sup>

然而，使严复对穆勒《论自由》一书发生极大兴趣的，除了是其中贯穿着维护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外，还同书中为维护思想、言论自由所作的论证有关。作为功利的自由主义者，穆勒关心的是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他提出思想、言论自由为什么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时，强调的是它的社会功用价值。他说：“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意见并且无保留地发表意见，这所以成为必要的理由”，就在于“这个自由若得不到承认，或者若无人不顾禁令而加以力主，那么在人的智性方面并从而也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毁灭性的后果。”<sup>②</sup>因此，从真理的获得以及知识的进步出发，社会应当保障每位公民有形成并且发表自己独立意见的自由。但要知道，穆勒除了是功利主义者之外，同时还是 19 世纪中叶少有的为个人自由作过出色辩护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体主义者，这可在《论自由》一书中他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所作的论证中得到证明。他开始时认为“只有培养个性才产生或者才能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sup>③</sup>但在最后却又提出：“说

① 《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 页。

② 《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59 页。

③ 《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68 页。